

# 现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重构历程

冯建勇

---

**提要:**传统观念认为,中国是个大陆文化国家,历史上中国的先民大部分活动集中在陆地上,故而对于海洋缺少应有的认知与了解。或者说,即便中国曾经拥抱过海洋文明,但是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亦有意无意地被淹没了。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不断得以补缀与重构,它在历史中国的面貌亦渐渐变得清晰:原来,环中国海一带历史上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一支,早在史前时期它已经充分表现出了其外向性的特点,并成为亚洲东南文化、技术输出地,16世纪至18世纪,环中国海一带更是进入了一个“大航海时代”;至于在传统中国的内缘,因海洋文化而形成的“海上板块”,对于中国历史疆域之构筑亦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关键词:** 中国海洋文化 重构 历史脉络 海上看中国 海上板块

作者冯建勇,历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海疆与海洋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金华 321004)

---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推动,在多学科研究的共同努力下,一个历史中国的身影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正是透过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人们开始认识到,中华文明之起源实为多元的、复合的,中原文化、海洋文化、游牧草原文化、山林文化等均有一席之地。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将讨论的主题限于中原与黄土文明,那么,近些年来,人们则逐渐将关注的焦点转向海洋。当然,这种社会关注与学术研究的转向,其初意并不是基于对海洋文化本身的重视,追其内在动因,乃是缘于在中国广阔的海疆海洋领域,中国与菲律宾、越南、日本、韩国等诸国家围绕黄岩岛、南沙群岛、钓鱼岛、苏岩礁等岛礁主权迭次发生争端,它让有识见者致力于思考一个现实问题,即如何才能最大程度上维护中国海疆主权地位。

最近,中共十八大报告更是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战略目标。从中国历史发展的纵深来看,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这样的目标,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亦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具有指导性的阐述在当前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反响。

受上述背景因素之启发,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写文章给予回应。仅就相关先行研究的具体内容之取向而言,它们多强调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利益,着重于海洋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

管控和海洋安全维护等诸现实战略。在笔者看来,建设海洋强国,一方面需要海洋意识的构建;另一方面则需要加强海洋力量的培育。这其中,国民海洋意识层面的构建需要有与之相匹配的海洋文化之支撑。有鉴于此,本文拟将中国海洋文化的生成、发展、衰落、复兴的过程作为考察对象,同时,聚焦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界为重构中国海洋文化历史发展脉络所做的探索与努力。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言“重构中国海洋文明发展之历程”,其要图旨在重新发现中国海洋文化曾经辉煌的一面,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过度诠释历史,构建中国海洋性国家的面貌;就历史中国与地理中国而言,中国从来都是一个陆海双构的复合型国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大陆文明处于主导地位,这点不容置疑。基于此,本文的主旨仅在于重构历史上中国区域内文明的一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历程。

## 一、中国海洋文化的补缀与重构

传统观念认为,中国是个大陆文化国家,历史上中国的先民大部分活动集中在陆地上,故而对于海洋缺少应有的认知与了解。这种观点似乎能够找到足够多的佐证。比如,在华夏——汉人主导的中国古代帝国文明中,中原王朝的思维逻辑就是从中心看边缘、从大陆看海洋,统治者常用“海内”一词表达自己治理疆域所及的范围,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海外”则用作表述其统治未及的地区,<sup>①</sup>海洋往往被看作是其统治所及的限界。<sup>②</sup>在儒家的心目中,如果说陆地是“兼济天下”之所,那么,遥不可及的海洋似乎只是政治失意者消极的遁隐地方罢了,孔子即有言:“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而李白“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梦游天姥吟留别》)的感叹,更表达出了陆地先民对于海洋风云变幻、难以预测、不可掌控的迷茫。

直至近现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古代中国多元文化互动的历史进程,常被简单地描述为“中国”(中原)对“四方”(非我族类的之地)的同化、统一过程,以及华夏、汉民人文的扩张过程,这就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历史教育的怪圈”之一——“中华大一统观念”。何谓“中华大一统观”?就是习惯于把汉族史看成是正史,其他的则列于正史之外。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秦、汉等便被串在一起,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边缘族群及境外接壤的周边地区的历史被几笔带过。

亦正是在这样一种被称之为“怪圈”的理念指导下,一些学者理所当然地将黄河流域看作是中华文化唯一的摇篮,而将广袤的南方看成一个落后的、被动的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地区。比如,最近有学者撰文指出,中华文明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样性、复合型文明,这并无问题;但在随后的论述中却一再强调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sup>③</sup>如同大多数学者一样,这位学者似乎忽略了中华文明的重要一支——海洋文明。事实是,即便有些学者能够关注中国海洋文化,但对其评价亦偏于消极,以至于有学者宣称,“中国的河姆渡海洋文明只是仰韶黄土文明的配角,妈祖文化对儒家文化来说连个配角也当不上。中国的历史是黄土文明、农耕文明的历史”。于是,在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当中,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于人们的疆域(国土)意识之中,海洋只是陆地的中断,从来没有与海发生过积极的关系;或者说,即便中国曾经拥抱过海洋文明,

<sup>①</sup> “二十五史”中出现了731处“海内”。在此仅列举几例较为典型者:“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史记》卷87《李斯列传》);“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农夫莫不辍耕释耒,输衣甘食”(《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楚汉久相持不决,百姓骚动,海内摇荡”(《史记》卷97《酈生陆贾列传》)。

<sup>②</sup> 古人对于海和海疆的早期认识,海是陆地的边际。《尚书·禹贡》记载,陆地疆域(天下)分九州,九州“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尚书·立政》亦言:“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大致的概念是陆地之四境有海环绕,称为四海,“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陆地疆域的整体又有“海内”、“海宇”之称,所谓“泄(屈)敌国,制海内”。

<sup>③</sup> 参酌姜义华:《中华文明多样性十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月下。

但是在历史的书写过程中,亦有意无意地被淹没了。

历史的面相果真如此吗?从20世纪初中期开始,伴随着考古学界对环中国海遗址的发掘,有关学者通过对相关考古资料的整理,将沿海一带中国先民的活动轨迹予以严谨补缀与科学串联;迨至今日,中国海洋文明的发展脉络业已渐次清晰,并以重构之态日益呈现其真实面目。

#### (一)考古学者对中国海洋文化的最初探索

考古学者很早就认识到以有段、有肩石器和印纹陶文化为代表的东南土著考古学文化的区域特殊性。作为我国考古学文化总谱系中特征性非常显著的一环,在东南印纹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过程中,一些学者先后注意到东南早期古文化因海洋人文特质、海洋联系而区别于中原北方华夏的大陆性文化。

20世纪30年代,林惠祥通过对福建武平遗址的考察指出,印纹陶遗存的特殊存在是东南文化与华北文化差异的考古表征,并认为东南地区是文化史上的“亚洲东南海洋地带”。林先生还从具体的文化因素论证了印纹陶文化在环中国东南海洋地带的空间分布特征,“武平陶器的曲尺文也见于马来半岛的陶器,有段石铤见于台湾、南洋各地,武平也有,由此可见武平的石器时代文化与台湾、香港、南洋群岛颇有关系”<sup>①</sup>。关于我国南方古越族及其先民与南洋群岛人群间的关系,林惠祥在深入研究古越族特有的有段石铤后指出:“有段石铤是出自大陆东南区,然后流传至台湾以及菲律宾,最后传到太平洋各岛。”<sup>②</sup>

林惠祥将中国东南、东南亚的史前土著文化称为“亚洲东南海洋地带”,这是现代学术文献中对环中国海土著海洋文化的首次考古学概括。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林氏将台湾史前文化看成是“祖国大陆东南一带的系统”,并将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归为大陆渔人驾乘独木舟沿海打鱼被大风或海流“漂去”,实际上肯定了史前中国东南沿海土著固有的海洋文化对“亚洲东南海洋地带”的辐射功能。稍后,他还撰文推断:台湾新石器人类应是由大陆东南部迁去;在中国大陆东南区即闽、粤、浙、赣一带地方发生,然后由东南传布于台湾、菲律宾以至太平洋三大诸岛。这实际上是在考古领域突破了“中原中心”模式,初步构建了独立的“东南区文化”概念。

稍后,梁钊韬对玻里尼西亚水神 Tangaroa 的历史来源作了研究,进一步补缀了中国东南沿海先民逐岛漂航、形成太平洋“南岛语族”的史前海洋交通史。梁先生认为,这个水神名字与广州方言“蛋家佬”读音颇为接近,是古代东南沿海的“但”人之后,属古越族的一支。他推论玻里尼西亚的水神“应指闽越沿海的越族蛋(但)人”,可能在西汉至南北朝期间迁移到南太平洋群岛,“他们航海的工具便是双身船”<sup>③</sup>。

20世纪50年代,凌纯声在《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等文章中将中国文化分成西部的“大陆文化”和东部的“海洋文化”两大类。他主要从原住民族史的角度将西部华夏农业文明推为大陆性文化的主流,将东部沿海蛮夷的渔猎文化推为海洋文化主体,即“亚洲地中海文化圈”,并以“珠贝、舟楫、文身”概括,区别于“金玉、车马、衣冠”的华夏大陆性文化。凌纯声指出,整个环太平洋的远东海洋古文化,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岸,它是东亚、东南亚、大洋洲、南北美洲的文化源头;同时,也是隐藏在中国文化即一般所说的中原文化下面的更为古老的“基层文化”。<sup>④</sup>在汉族中原移民开发南方的过程中,强盛的农业文明吸收涵化了当地海洋发展的传统,创造了与北方传统社会有所差异的文化形式。

① 林惠祥:《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

② 林惠祥:《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厦门大学学报》1955年第4期;另参阅林惠祥:《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铤》,《考古学报》1958年第3期。

③ 梁钊韬:《西瓯族源初探》,《学术研究》1978年第1期。

④ 凌纯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海外杂志》1954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台北联经图书,1979年。

南中国的沿海地区,长期处于中央王朝权力控制的边缘区,民间社会以海为田、经商异域的小传统,孕育了海洋经济和海洋社会的基因。凌纯声宣称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主要系指中国东海到南海间的水域,这是一个亚洲与澳洲之间、亚洲大陆东南与周邻岛群之间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文化交流、传播的纽带,是土著海洋文化一体化的熔炉,与林惠祥所说“亚洲东南海洋地带”实为同一范畴。

## (二)海洋文化在中华文化区系地位之探讨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史观逐渐代替了旧史观。整个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被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史观串起来;但在这背后,还隐隐约约地显现着某些“旧史观”,中原中心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该论说的核心内涵大抵认为:中原地区文明高于周边地区,随着中原的人们向四周迁徙,中原文明之光才辐射于四夷之地,中原周边之地是作为中原文明的辐射对象与接受者而存在的;中原先进的文明向四方落后地区的传播,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

然而,随着东南亚、南太平洋群岛史前考古工作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一地区原始文化的主要源头在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地区,环中国海土著的海洋文化作为中华文明源流的重要一支的面貌愈发清晰。1979年,在南京举行的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苏秉琦提出将我国早期古文化的关系格局划分为“面向海洋的东南部地区和面向亚洲大陆腹地的西北地区”两大部分,认为“从山东到广东,即差不多我国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区别于和它们相对应的西北广大腹地诸原始文化”,并且按照它们各自的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向前发展。<sup>①</sup>这就是说,东南早期土著是一个广义的海洋文化体系,是指一个相对独立的面向海洋、取向海洋,与海洋发生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东南地区早期土著民族文化群体。

1981年,苏秉琦在探讨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时再次提出,大约相当距今4000—5000年到5000年前,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的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其时,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他进一步从全国范围将现今人口分布密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伴随着苏秉琦的“区、系、类型”考古学文化框架的提出,以往“善于辑舟”的环中国海土著先民所开创的中国海洋文明亦随之被纳入其研究范畴。随后,苏先生还逐个地论证了“善于辑舟”的环中国海土著先民对于中国海洋文化的开创之功:

(1)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该地区的古文化是一个整体,山东半岛自然地理、人文条件既有它内向的一面,又有它外向的一面。围绕泰山的鲁西南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分布密集,是中国一个重要古文化区。齐人文化确是源远流长,自成一系,同时,从一开始就从海上与辽东相连,从陆上与殷、周、燕交通,兼收并蓄。并作为中国腹地与中国东北部以及东北亚之间的重要通道,由于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古代起有特殊作用。

(2)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因为面向海洋,古代文化有不少共同因素,同时对中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诸特征的形成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3)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地带是几何形印纹陶分布的核心区,是一条自古以来形成的南北通道,华南与中原的关系,与南海诸岛以及东南亚广大地域的关系都可以在这条南

<sup>①</sup> 苏秉琦:《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提纲》,《文物》1978年第3期。

北通道上寻找答案。闽北、闽南和台湾是各有特征又密切相关的三个文化小区,是中国古文化与海洋文化接触的前沿中心,又是环太平洋文化圈的重要一环。

(4)渤海既可统属在广义的中国北方,又可统属于中国面向太平洋(环太平洋)的重心位置,它是打开东北亚(包括中国大东北)的钥匙,又是连结东南沿海的龙头。

对于同一问题,童恩正亦指出,尽管现在要对中国南方的古文明作一全面的评价还为时尚早,但现有资料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是如何汇合了千溪万壑的地方文化而形成的,“因此中国南方在古代为中华文明所作出的贡献,是需要重新加以评价,慎重加以研究的”<sup>①</sup>。童氏所指的中国南方,大致包括了北纬 33 度以南直至南海诸岛之地,北以秦岭和伏牛山与黄河中游中华古文明的核心地区为界,西依横断山脉与世界的另一个古文化中心——印度为邻。他还着重提出,历史上中国疆域的东、西和南面都濒临大海,富于开拓精神的中华民族的先民很早即扬帆远去,驶向浩瀚的太平洋,将根植于大陆的中华文化传向万顷碧波中星罗棋布的岛屿,与此同时也吸收了海洋文化丰富多彩的内容。<sup>②</sup>

### (三)“从海上看大陆”、“从海洋看中国”的尝试

进入 21 世纪,杨国桢开始对“大陆思维体系”指引下的涉海研究给予批判。针对“早期的海洋文明实际上都是接胎、孕育于农业文明之中”的言论,杨氏认为:“一般的历史教科书和文明史的著作,都认为古代世界是二元体系,也就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和融合,现在看来这个二元论是有问题的,应该再加上海洋文明,因为海洋活动有它自己的起源和发展的历程,自成一个世界,与农业世界、游牧世界是并存互动的,也是人类历史存在的一种实现方式,所以海洋不仅仅是一条路,也是一个生存发展的空间、一个文明的历程。”<sup>③</sup>吴春明则通过对沉船、海底文物的研究,发现“善于用舟”的百越及其他土著先民在中国东南乃至环中国海海洋文明上具有开创之功,重新构建了数千年前东南沿海土著族群开发海洋、以海为田的海洋生活史、逐岛漂航形成太平洋“南岛语族”的史前海洋交通史的轮廓,否认了土著先民的早期海洋文明与华夏——汉人兴起时代的晚期海洋文明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吴氏强调指出,不管是东南区的考古研究还是历史重建,都应站在东南看海洋,而不是从中原内陆看东南海上,同时要摆脱华夏、汉民族中心主义史观的束缚,尊重土著先民开创早期海洋文化的历史,从“百越——南岛”的“善于用舟”到汉民人文的“大航海时代”,全面、系统地再现以东南沿海为中心的环中国海海洋文化史。<sup>④</sup>

### (四)海上板块对中国历史疆域构造之影响

近些年,于逢春将“文明板块”概念引入中国疆域形成路径研究,认为中国疆域是由“大漠游牧”、“泛中原农耕”、“辽东渔猎耕牧”、“雪域牧耕”和“海上”五大文明板块及其在此诸板块上兴起的各种政权在长时段历史过程中不断碰撞、彼此攻防与吸纳,渐次融为一体,并最终由清朝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底定了中国版图。<sup>⑤</sup>

所谓“海上文明板块”,其范围,从长时段的东亚历史来看,是由介于欧亚大陆东部弓形陆缘与该大陆东部海中的弓形列岛链,以及勘察加半岛与澳洲大陆北部之间的若干个海域圈构成。于先生专门撰文阐述了海上文明板块的形成及其对中国历史疆域形成的重要影响:(1)因由“海上板块”及海上中国社会力量大量吸纳白银,明清两朝最终实现了银本位货币体制。该体制促进了明清两朝商品经

①② 童恩正:《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南方民族考古》1987年第1辑,第1页。

③ 杨国桢:《关于中国海洋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海洋文化学刊》第7期,2009年12月,第3—4页。

④ 吴春明:《“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的土著生成与汉人传承论纲》,《复旦学报》2011年第1期。

⑤ 于逢春:《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

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厥功至伟;(2)通过海上板块,美洲农作物从海上传来与普及,造成了晚明,特别是清初人口的爆炸,伴随着这些移民向四周扩散,以往主权管辖模糊的地域逐渐被明确地统合到中国疆域管辖体制之中;(3)经由海上板块的通道,从澳门引进的西洋火器传入中国内地,它不但造成了明清易代,而且对于对外抵抗沙俄侵略,对内改土归流、平准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4)郑成功凭借着海上中国的海商力量收复了台湾,并长期主导着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上贸易权,为后来中国海疆的奠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sup>①</sup>

由此可见,于逢春构筑的“海上文明板块”,不仅仅是从海上的视角看世界,另一个较具启示意义的一点,乃是从宏观的历史构架的视角探讨了该板块在中国疆域形成路径中的地位,这也是认识和发掘海洋文明对于中国社会各个层面之影响的一个重要探索。

## 二、中国海洋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从地缘政治的视野来看,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陆海双构的国家政治实体,漫长的海岸线、广阔的沿海地带与岛屿带的分布,以及广阔的平原、草地、山脉的交错,均说明了这一点。然而,传统中国王朝的腹心一般处于中原地带,历代中国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演绎,绝大多数时候,是在广袤的内陆原野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其主流文化特征具有厚重的黄土文化的色彩,形成了独有的农耕文化。一般而言,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农耕文化经常依附于政治上专制加集权、经济上超负荷剥削、文化上“严华夷之辨”的儒家文化。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古代中国沿海一带,“人满财乏”,受自然条件多山、生存环境恶劣的影响,其向度往往将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耕海为田”、“贩洋谋生”。亦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不同于内地文化属性的“海洋文化”。

早在史前时期,中国东部沿海一带的先民就与海洋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较为典型有长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以及沿环中国海周边分布的贝丘遗址。然而,由于历史的、地缘的、文化的原因,海洋文化相对于中原儒家文化而言,被视为一种“边缘文化”,经常会在客观上遭受来自内陆的强势的、集权的“农耕文化”的挑战和挤压。用凌纯声的话来说,秦统一六国实际上就是以秦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对以齐、楚等为代表的海洋文化的征服。他还认为,秦始皇内外对调移民,隔绝海外交通,是大陆文化对于海洋文化所实行的消极海禁政策。尽管如此,局促于沿海一端的中国海洋文化并没有中断自己的发展演进历程,自秦汉帝国以降,中经隋唐,到了宋元时代趋于鼎盛。秦汉时期,是中国越洋航海工具成熟的时代。汉代远洋船已经使用了分隔舱技术,而且秦汉航海家已经能够熟练地利用各种星体来定向导航,并运用“重差法”对海上地形地貌进行精确测量。同时,因为对西太平洋与北印度洋上的季风规律也基本上掌握,汉代的风帆技术已经成熟,能广泛利用信风,并发明了橹、舵。借助于这些技术,西汉王朝在继续保持传统的渤海、黄海、日本海、东海、南海等沿岸航路的同时,开辟了从马六甲海峡到北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汉书·地理志》就记载了当时西汉王朝对南海各属国的交通路程。到唐宋的时候,航海事业更为发达。因为熟练地运用了对远洋帆船的安全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水密舱”技术,唐朝远洋船队不但轻松地穿越阿拉伯海与波斯湾,而且能够从广州直航红海与东非海岸。其航程之绵长,航区之广阔,已远远超过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南洋人等擅长航海民族所能达到的水准。至宋代,已能建造长达三十余丈的大船,海船可以载五六百至一千人,载重五千料以上。已经知道把罗盘运用到航海上去。在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中航行,只有掌握了罗盘定向的技术,才不至于迷失方

<sup>①</sup> 于逢春:《论“海上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5期。

向。<sup>①</sup> 中国有很多的海船航行于南海一带,远的可以到达印度洋上波斯湾头。13世纪、14世纪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阿拉伯人伊宝拔都在他的游记里都有提到当时航行南海的中国海船,即为明证。

从较为明确的时间表来看,至少在唐宋以降,亦即中国经济重心南北大转移之前,中国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的发生和衍变仍然处于一种自发自为的境况。其时,作为王朝决策的主导者和制定者,帝国统治者没有必要将过多的精力用于处于王朝政治边缘的海洋,显然,帝国的政治竞争力量和需要绥定的异己力量主要来自帝国的核心区域。于是,幸运的是,由于统治者的关注重心不在海洋,这反倒客观上为中国海洋文化的自我发展创造了一种难得的、宽容的环境——尽管它没有得到王朝统治者的扶持,但亦因此而没有遭受彼时以传统的主流农耕文化为载体的行政体制的束缚和限制。并且,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就属性而言,可称得上是一种外向的、竞争的文化体系。不言而喻,对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来说,除非面临重大突发的自然灾害或政治格局变动,王朝统治者毋需改变既有的政治运行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即可安身乐命。亦正是在这样一种自然态势之下,除非出现一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王朝的运转方式不会发生改变。严格地说,明代以前的历代王朝政治与海洋世界的关系,主要属于古代中国之“华夏一四方”族群与文化框架内的大陆性文化为中心的“国家社会”与海洋性的环中国海“海洋(地方边缘)社会”的关系,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范围内的文化整合,它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海防问题。

历史的大河奔流向前直至16世纪,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与地理大发现,以及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技术成果,西方各大国相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显而易见,在西方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海权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可以说,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正是从航海大发现开始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因由时代之变迁,在中华帝国内部,大陆文化逐渐凸显出了其农耕文化封闭性、落后性的一面。亦就在西方诸强在海上崛起的同一时期,明朝“倭乱”兴起,海防压力凸显,于是,秦帝国的政策在明清时代的海禁政策中得到了再度的认同和延续。这一时期,海疆经略、海防事迹成为了明清两代王朝对环中国海海洋地带主权的象征和历史记忆。尽管如此,16—18世纪的中国海洋文化发展态势依然可以称得上蔚为壮观。向达通过对《两种海道针经》的研究,还原了16—18世纪中国与当时“东西洋”各国的海上交通,以及中国海舶在东西洋各国间航行往来的大概情形。<sup>②</sup>毋庸置疑,《顺风相送》、《指南正法》所记录的海上往回针路、气象观察方法及各地山形水势,都是那些火长们长年出入惊涛骇浪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它们再现了这一时期中国古代航海、中国海洋文化对外传播交流的历史场景。

直至19世纪初期,依照德国学者弗兰克的说法,中国依然是东亚海上贸易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些白银“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sup>③</sup>。然而,在一种近似封闭的运转体系下,传统中国海洋文化鲜有发展,其继承的历史遗产亦必将终有消耗殆尽之期。于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在一种源于西欧的新型海洋文化的冲击下,无论是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内陆中原文化,或是处于传统中国边缘的海洋文化,都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近代史困境。彼时,西方列强渐次浮海东顾。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辛丑之变、中法马尾海战、中日甲午战争等历次战争,列强无一例外地凭藉的一个重要手段即是沿海而上,从南到北,利用其强大的优势舰队将中国军队击败于旦夕之间,从而使中国丧失了近代化进程的最有利时机。目睹此千年未有之变局,清统治者亦曾试图振作,努力发展海权。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矢号的“洋务运动”从制器开始,先后成立江南制造总局、福建马尾船厂,制造了大量船只,组建南洋、北洋等舰队;甲午战败以后,“海防思想”大兴,政务

<sup>①②</sup> 向达:《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2、10页。

<sup>③</sup> 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中文版前言。

处陈情“现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自强之用,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sup>①</sup>,进而于1907年建立海军处。这些举措尽管在实践层面对海权之维护的收效寥寥,但不管怎样,这确实反映了中央政府层近代海洋意识的勃兴,同时亦表明了以“筹海”为中心的近代海防观念的肇端。

与此相对应的是,古老的、民间的中国海洋文化在近代中国沿海一带以畸形的方式予以彰显。随着沿海港口城市次第被动地开放,环中国海地带的社会经济亦畸形地发展起来。昔日的乡村小镇上海一跃而成为“十里洋场”,可谓这种变迁的一个缩影。当然,这种变迁并不仅限于一般的沿海港口城市经济的发展,当中更有沿海人民自身生活方式和海洋意识的复苏。伴随着朝廷海上贸易的开禁,民间海上贸易和下南洋、捕捞业开始强势复苏。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东南沿海地区一直走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前列;并且,随着人类对海洋世界认识愈发深刻,对海洋经济开发愈见成效,其经济社会功能、国防战略地位也在不断得以提升,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了“海洋强国”战略。事实证明,一旦海洋文化摆脱农耕文化的束缚,其自身的活力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迸发。

### 三、结 语

黑格尔曾说过,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的国家。<sup>②</sup>这句名言经常被人们引用并过度诠释,作为中国不曾拥有海洋文化的注脚。事实上,黑格尔从来不曾否认历史上中国曾经拥有过海洋文化,他的本意或许只是想要表达蔚蓝色的文化相对于黄土文化的黯淡身姿。在黑格尔看来,中国海洋文化(即便有)根植于中国人淡漠的海洋意识中,殊难发挥积极作用。晚清以降,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频繁使用的批评术语,包括“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停滞的帝国”等词汇,这些无不体现了其对中国固有的传统农耕文明的刻板印象。

然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伴随着海洋考古研究之发展,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脉络得以清晰重构与呈现;随后,大致在1950年代,国内史学界开始从中华文明源流的角度,探讨了中华文化区系的问题,进一步勾勒出了环中国海海洋文化体系在整个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中的区域地位;直至当代,部分学者通过对既有的环中国海海洋考古遗址和遗存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从海洋看大陆、从海洋看中国的“海洋文化理念”;并且,已有研究从疆域构造的角度考察了海洋板块在中国历史疆域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丰富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正是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海洋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不断得以补缀与重构,它在历史中国的面貌亦渐渐变得清晰:原来,环中国海一带历史上就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一支,早在史前时期它已经充分表现出了其外向性的特点,并成为亚洲东南文化、技术输出地,16世纪至18世纪,环中国海一带更是进入了一个“大航海时代”;至于在传统中国的内缘,因海洋文化而形成的“海上板块”,对于中国历史疆域之构筑亦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即便在当下,对中国海洋文化的研究与探讨,亦能够找到其现实关怀。当前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诸多海洋主权争执,解决这些争议性分歧,不外乎两种手段:其一是追述与主张历史性权利;其二则是在国际法层面与之展开论争。而在主张历史性权利这一方面,与重构历史中国海洋文化实有关联。是故,从此意义而言,加强对海洋文化的研究,对于当前乃至未来某个时期中国海疆主权问题的维护亦具有前瞻性功用。

责任编辑:徐吉军

① 转引自周益锋:《“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②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第135页。

作者: [冯建勇](#)  
作者单位: [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海疆与海洋文化研究所 金华 321004](#)  
刊名: [浙江学刊](#) PKU | CSSCI  
英文刊名: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年, 卷(期): 2013(6)

## 参考文献(21条)

1. [《史记》卷87《李斯列传》](#)
2. [《史记》卷92《淮阴侯列传》](#)
3. [《史记》卷97《酈生陆贾列传》](#)
4. [古人对于海和海疆的早期认识:海是陆地的边际.《尚书·禹贡》记载,陆地疆域\(天下\)分九州,九州“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尚书·立政》亦言:“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大致的概念是陆地之四境有海环绕,称为四海,“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陆地疆域的整体又有“海内”、“海宇”之称,所谓“拙\(屈\)敌国,制海内”](#)
5. [姜义华 中华文明多样性十论](#) 2013
6. [林惠祥 福建武平县新石器时代遗址](#) 1956(04)
7. [林惠祥 台湾石器时代遗物的研究](#) 1955(04)
8. [林惠祥 中国东南区新石器文化特征之一:有段石铈](#) 1958(03)
9. [梁钊韬 西瓯族源初探](#) 1978(01)
10. [凌纯声 中国古代海洋文化与亚洲地中海](#) 1954(03)
11. [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 1979
12. [苏秉琦 略谈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提纲](#) 1978(03)
13. [童恩正 南方—中华民族古文明的重要孕育之地](#) 1987(01)
14. [杨国桢 关于中国海洋史研究的理论思考](#) 2009(07)
15. [吴春明 “环中国海”海洋文化的土著生成与汉人传承论纲](#) 2011(01)
16. [于逢春 构筑中国疆域的文明板块类型及其统合模式序说](#) 2006(03)
17. [于逢春 论“海上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 2012(05)
18. [向达 两种海道针经](#) 1982
19. [贡德·弗兰克;刘北成 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2008
20. [周益锋 “海权论”东渐及其影响](#) 2006(04)
21. [黑格尔;王造时 历史哲学](#) 1956

引用本文格式: [冯建勇 现当代中国海洋文化的重构历程\[期刊论文\]-浙江学刊](#) 2013(6)